

江西,水土宜陶。除了瓷都景德镇的千年窑火不熄,在我省其他地方亦散落着诸多古代名窑,影响深远且广泛,如洪州窑、吉州窑、白舍窑……我们特别推出解密江西古代名窑专栏,本期关注洪州窑。

——编者

从青瓷到青花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

解密江西古代名窑

最古老的陶罐

中国是陶瓷的母国。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来自鄱阳湖平原的万年仙人洞。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这个原始初民的聚集地(现万年县大源镇)就出现了原始陶器的烧造和使用。

记者探访了万年仙人洞。但见主洞空幽深,洞口朝向东南,开阔并向东伸展,剖面呈弧形,分成南北4个支穴,可容纳1000余人。

1962年春天,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在洞口发现了文化堆积,里面包含有蚌壳、骨器、陶片、烧土、炭屑,还有大量的碎骨、螺蚌壳、蚌壳等遗物。在一些蚌壳和骨器上还有圆孔,骨器磨制光亮,粗砂红陶片上饰篮纹或粗绳纹。

1993年、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仙人洞和邻近的吊桶环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由于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器的发明与农业的出现、人类的定居生活等有关,这些活动是伴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而发生的,所以认为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应在大约一万年。同时由于早期陶器保存下来的陶片比较碎小,无法提取里面残留的有机物进行年代测定。

直到200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与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在重新清理出来的考古地层剖面上采集了一系列碳-14测年样品和地层微结构样品,证实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万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

仙人洞考古以及检测是中美合作进行的,“出土2万年以上陶罐”并非中国一家之言,而是中美共同研究的结果。项目参与者之一,美国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欧弗·巴尔·约瑟夫曾断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意味着时代更早的陶器可能会在中国南方发现。”本次中美联合考古队的研究成果于2012年在国际知名期刊Science上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来自万年仙人洞的“最古老的陶罐”还入选了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此外,仙人洞还发现了1.2万年前的人工驯化的稻植硅石,是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

陶罐作为蒸煮器,稻米是主食,动物蛋白来自鄱阳湖水网地带的淡水鱼,也就是说“饭稻羹鱼”这种饮食方式,我们沿袭了一万多年。沧海桑田间,这是保留在血脉间亘古不变的基因和长情。

稻作农业的诞生,无疑是史前人类的一次伟大革命。它不仅提升了人类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能力,更推动了社会的分工和组织形式的演变,最终催发了文明的诞生。赣鄱大地是长江流域文化的滥觞地之一,先民就是从这里出发,以陶罐盛水,暂时离开河流完成更远的探索;带着稻种和火种,播撒文化、交流融合。

至今仙人洞方圆数百公里内,仍出产各种滋味丰富的米粉,余干鳊鱼煮粉、铅山烫粉、景德镇冷粉、新余腌粉、南昌拌粉、临川牛杂粉、万载扎粉……南昌、九江、萍乡、吉安等地的炒粉更是美味互不相让。

神州大地,许多吃米粉的地方,溯源都能上溯到鄱阳湖周边的稻作文明。仙人洞不远处的鄱阳瓦屑坝,寄托着久远的乡愁和故乡的滋味。人们走得远了,也许只有归途,忘了来路。

某种程度上,我们低估了江西“陶”“瓷”“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隐喻,缺乏对其更深层次的研究、探索和阐释。

原始青瓷,文明的显影

时光拉回到1973年8月初,位于赣中腹地的清江县(现樟树市)艳阳高照,当地组织民众兴修吴城水库。在劈山开渠的轰隆声中,泥土中出现的一些奇形怪状的器物碎片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清江县博物馆及时上报了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大家将文物标本照片寄往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经鉴定,一个沉睡在历史烟尘中的文明逐渐显影、清晰,这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夏商时代文化遗址。

吴城遗址中陶纹、原始瓷、龙窑、铸铜遗迹的发现,标志着该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专家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江南一带在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出现了瓷质陶,“原始青瓷”为后世瓷器的烧造奠定了基础。大量的陶纹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

吴城文化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40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结束了江南考古长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混乱。尤其是其中原始青瓷的身影,更为江西补齐了陶器-原始青瓷-青瓷-彩瓷-青花瓷的拼图。

吴城遗址里发现了陶窑区、冶炼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的陶器、铜器、石器等多达上千件,根据对其中原始青瓷器的研究,证明赣江下游这一地区是青瓷的发源地之一,洪州窑就在吴城遗址下游不远处。

原始青瓷是瓷器的鼻祖,与白陶器及印纹硬陶器相比,它有坚硬耐用、器表有釉不易污染及美观等优点。青瓷是以瓷石为制胎原料,器面施单色青色釉,胎体必须经过1200℃至1300℃的高温焙烧,制成较低吸水性的工艺产品。

寻找洪州窑

这个秋冬,记者在赣鄱流域漫溯,足迹遍及南昌市新建区、红谷滩区、南昌县以及宜春市樟树市、丰城市等地,只为寻找青瓷往事。当年,这里是洪州的范畴;再往前,是吴城文化圈;更往前,可以追溯到仙人洞的那个陶罐。

原始青瓷经历了漫长的实践积累后,发展到东汉时期(25~220),随着烧造温度的提高和瓷质原料的使用,青瓷在江西豫章和浙江余姚、句章(今慈溪)等地烧造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成熟的釉陶瓷器,中国最早进入“瓷”的时代。青瓷是人类从陶器生产迈向瓷器生产的突破性标志,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项发明创造。

魏晋时期,北方的窑场因制瓷原料等诸多因素烧造出了区别于南方的白瓷,由此“南青北白”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直至彩瓷的出现。

洪州窑是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有关洪州窑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于唐德宗二年(764)著的《茶经》。其中《四之器》中写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这是洪州窑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窑窑首次见于著录,却被“茶圣”排在了最后一位,“……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曾为洪州窑鸣不平:陆羽照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来定名窑优劣。从饮茶的角度,仅以瓷色为主要标准去评定洪州青瓷,只能算是饮茶人的一种偏见,没有对洪州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不过《茶经》在谈及茶具中又说:“瓠,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同样从饮茶的角度推崇洪州窑生产的瓷瓠,认为是雅器,而其他青瓷和白瓷窑场均没有提及有生产瓷瓠的,可见洪州窑瓷器的特色和质量,还是名列前茅的。瓠是煮茶用具,与风炉浑然一体,它形似大口锅,不同处在于方形耳,底部稍尖,类似肚脐眼。瓠在古代很流行,但到了宋朝就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现代更少人用,连“瓠”字都“退役”了。

洪州窑生产的青瓷,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唐玄宗时期,洪州窑瓷器作为地方珍品进奉给皇帝。《新唐书》105卷《韦坚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天宝二年(743),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引产水抵长安“望春楼”下,凿为“广运潭”,唐玄宗诏群臣到望春楼一起观新潭,韦坚率江淮并汴洛漕船300艘首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漕船各署郡名,满载各郡轻货,其中“豫章郡力土瓷、饮器、茗铛、釜”,玄宗随后将其“赐贵戚朝官”。

豫章名瓷就是洪州窑所产。参加这样盛大的手工业和土特产品的水上展示,并被进贡给皇帝,足以说明洪州窑青瓷已享誉天下。

这三条记载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非常真实。洪州窑产品器类繁多,造型规整精巧,美观实用。胎质细腻致密,釉层均匀透亮,玻璃质感强,釉色黄中显青,或青里泛黄,装饰技法多样,纹饰简朴、生动,刻划、拍印、戳印、镂孔、点彩、捏塑等技法并存,为同时期其他青瓷窑址所罕见。在陶瓷工艺方面,使用化妆土装饰、匣钵装烧、火照测温、发明玲珑瓷等,在中国陶瓷烧造史上均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古代把手工业视为贱业,洪州窑在历代文献著录中罕有记载。五代南唐以后洪州窑停烧,渐渐湮没无闻。

洪州窑重现天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958年初,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队曾在丰城县曲江镇“曲江街东端”发现“古代陶窑遗址一处……面积达数十亩,大部分为菜园地,陶片遍布地面,厚度约达一米……陶片之中夹杂有宋、元、明古代瓷片,以明代的居多,甚至还有整个的青瓷碗,证明这个陶窑是明以前的遗物”。由于时代局限,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处遗址就是位于现今丰城市曲江镇曲江小学操场上的窑仔岗洪州窑遗址。

1974年,南昌县文物工作者在本县岗上乡赣江岸边的上湖村一带发现了较多的青瓷器及残片,并发现有火烧土,专家认为这里是一处烧造青瓷的古窑址。

1978年,文物工作者在丰城县同田乡龙雾洲渡口江湾畔一带,发现了晋至南朝时期的洪州窑遗址。

1980年初,丰城县文物陈列室工作人员万良田等在赣江东岸的罗坊村和窑里村发现面积约600平方米的晚唐、五代青瓷窑,这些窑窑遗址的发现扩展了洪州窑的分布范围和烧造下限。

1983年,丰城县文物普查队在丰城石滩乡港塘和寺背发现两处东汉至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这两处窑址的生产时间下限当在东晋南朝时期,而上限可以达到东汉晚期。

普遍看法是,洪州窑址群主要位于丰城,沿赣江下游两岸分布,目前丰城境内共发现密集分布的31处窑场,绵延20平方公里。记者田野调查时,在丰城曲江一带的荒烟蔓

草中依然能发现窑迹,扒开浮土,还能掘出各式残片,有陶,有青瓷,还有青花瓷,足见洪州窑的青瓷生产烧造于五代,但当地的陶瓷产业到元、明阶段还有零星窑火。

惊喜的新发现

洪州置于隋开皇九年(589),治设豫章。唐时洪州管辖范围相当于现今修水流域、锦江流域和南昌县、进贤县、丰城市等广阔区域。1949年5月,丰城县属南昌专署管辖;1959年,丰城归宜春专署管辖。

虽然治所变迁,但洪州窑属于南昌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10月25日,“从赣江到长江——文化学者共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南昌段)建设座谈会”举行,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首席专家徐长青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作为洪州窑毗邻分布的重要区域,南昌应当把洪州窑的展示和宣传做得更加丰富些,并使之成为南昌文旅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南昌历史文化的面貌。二、南昌县应当组织力量,在洪州窑的深入调查、研究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摸清洪州窑可能在南昌县的分布范围。

徐长青的话语犹在耳,就传来了关于洪州窑的好消息。

11月21日,李渡镇郑家山李渡酒庄在修建停车场时,意外挖出多件古瓷及瓷片。11月27日上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组织考古专家进行现场勘察。专家推断,此地应是洪州窑址,属于晚唐到五代时期。

业界为此兴奋不已,因为洪州窑的认知可能因此刷新,除丰城外,南昌县、进贤县亦有分布。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何冰提出了一种观点:“洪州窑此前多在赣江流域发现,此次如能确定是洪州窑,则填补了这种著名窑口在抚河流域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12月4日,记者在发掘现场看到,该窑址已出土多件青瓷碗、盏、瓶、壶,因器型烧制失败的废弃残件更多,支烧器、红烧土、废窑渣随处可见,根据所处区域的高差与地形走势,初步判断这是一座生产生活用青瓷的洪州窑龙窑。



12月4日,进贤县李渡镇郑家山刚刚出土的瓷瓶,下为支烧器(两者位置为模拟,非出土时对应)。吴志刚摄

“这一片属于丘陵地带,旁边又有小溪、河流,非常适合烧窑,在发现的遗址周边区域可能会有窑址集群。”江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张文江介绍,附近抚州市临川区云山镇的瓷土资源丰富,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都还一直给景德镇供应瓷土,而郑家山离云山镇很近,并且交通便利,所以遗址旁边可能会有窑址。

后记 最美的一棒接力

由于原料逐渐枯竭,洪州窑五代后慢慢黯淡,有手艺人沿着赣江进入鄱阳湖,上溯昌江,惊喜发现昌南镇(宋真宗景德元年定名为“景德镇”,辖于浮梁县)的窑火正旺。从青瓷到青花瓷,景德镇窑完成了瓷国最美的一棒接力。“镇上人”曾自豪地认为“昌南”为中国取了一个英文名,虽然这可能是个善意的误会,但景德镇瓷器对于全球化的影响毋庸置疑。在欧洲人偷师学艺的过程中,浮梁高岭村出产的优质瓷土,被欧洲化学家定义为“kaolinite”(高岭土),并满世界去寻找这种黏土矿物,以仿制瓷器。

青花瓷与中国古代的五行之说高度对应,金(钴料)、木(热量)、水(制坯)、火(窑火)、土(瓷土),以充满仪式感的火焰合成了这世间尤物,还有什么能比青花更适合阐释中国人的五行之意?

中国在元、明时期已经到达瓷器业的顶峰,江西为世界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第一批充满东方意境和哲学趣味的商品,不但是艺术,也是生活。



陶

瓷是中华文明的闪亮名片和重要信物。

陶器属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人工材料,它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入崭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改变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使人们能进食经过高温处理的食物。饮食结构的变化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催生了思想的曙光。

制作陶器的“陶轮”,是车轮的技术基础;烧制陶器的炉温是金属冶炼的基础;制陶过程中发现红烧土,进而发明建筑材料“砖瓦”……相当部分的人类科技,最初起源于制陶或其衍生发明。

瓷与陶一样,都是土与火的艺术,但土质与火温的不同,导致两者质地不同,性情各异。瓷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和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陶进化的结果。

从陶到瓷,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陶瓷文化凸显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连续性,展现出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这段辉煌的历史,不仅值得我们记忆和歌颂,更需要我们去继承、发扬和深入研究。

其中,我们身处的赣鄱大地,从最早的陶,到原始青瓷,至颜色瓷,经青花,再到现代的瓷,犹如一棵生命之树,集齐了陶瓷进化的年轮,至今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陶瓷业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是江西的独特荣光,也是值得珍藏的时光切片。我们探访过风糜赣地的陶瓷往事,在田野里寻找融入尘烟的窑口,是为再现这团最完整、从不曾断代的不灭薪火。

11月21日,进贤县李渡镇郑家山李渡酒庄在修建停车场时,意外发现疑似洪州窑遗址。专家推断,挖到的地方是生产核心区域,属于晚唐到五代时期的窑址。这团薪火的光亮,仍在令人眼前闪烁——

